

新中国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创建三十周年纪念



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子文库

FAHAI SHI BEI

法海拾贝

——赵永琛法学文集

赵永琛 著

群众出版社

新中国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创建三十周年纪念



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子文库

FALHAI SHI BEI

法海拾贝

—— 赵永琛法学文集

赵永琛 著

群众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法海拾贝集: 赵永琛法学文集 / 赵永琛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9

政法机关内部发行

ISBN 978-7-5014-4579-0

I. 法… II. 赵… III. 法学—文集 IV. D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439 号

法海拾贝集——赵永琛法学文集

著 者/ 赵永琛

责任编辑/ 白玉生

封面设计/ 王 子

技术设计/ 祝燕君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890×1240 毫米 32 开 15.875 印张 408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4-4579-0 / D·2213 定价: 38.00 元

政法机关内部发行

总 序

1979年至2009年,三十年一路走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专业建设历尽艰辛,收获辉煌。

歌乐山,人杰地灵,这里不仅有永恒的革命先烈精神,也孕育了无数法学英杰。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即诞生于此。1979年6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提出在西南政法学院创办刑事侦查专业的申请,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诞生,由此开启了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的辉煌历程。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侦查学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建立侦查学系,2000年侦查学系组建为刑事侦查学院。历经近三十个不平凡的春秋的辛勤耕耘,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有独领风骚的辉煌历史,更有阳光灿烂的现在与无限风光的未来。

在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三十周年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与群众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子文库”,文库既是对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三十周年的献礼,也是展示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三十年的点滴成果,同时也作为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不断进取、延续辉煌的启程点。

探索侦查学教育、侦查理论研究和侦查实践需要三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与规律,是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三十年建设的主线与核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与摸索。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是理论研究与发展的科学理想。但理想与现实永远存在矛盾,理论脱离于实践成

为常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我国学术理论发展的标尺。相比较于其他法学学科甚或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侦查学更为突出实证研究,贴近实战、指导实战是侦查学生命力所在,也是侦查学教育与理论研究发展方向之一。在西南政法大学三十年侦查学专业建设过程中,始终不懈地探索侦查学教育与发展的科学规律。侦查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侦查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当是应用型人才。必须既重视实践又重视理论,既重视专业又重视基础,既要追求人才的长期效应,也要重视人才的后劲和潜力。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始终密切关注侦查学科发展趋势与侦查实践需要,不断调整侦查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侦查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犯罪特点与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侦查手段与方法,以科学指导侦查实战为目标,实现侦查理论与侦查实践的水乳交融。

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与风范始终贯穿于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建设过程中。通过严谨扎实的工作,讲求实效,注重实际,不断创新,三十年的侦查学专业建设硕果累累。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专业成为重庆唯一,西部领先,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业,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特”的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国家级侦查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与此同时,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教学团队也被评为重庆市市级优秀教学团队。侦查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与成熟,从最初的一个本科专业发展到现在侦查学与警察学两个硕士学科点,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治安学、经济犯罪侦查四个本科专业,一个职务犯罪侦查专门化班。三十年侦查学教育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主要从事侦查学教育、理论与研究与实务工作,大多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业务精英。

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辉煌已成为昨日。侦查学专业建设任重道远,永续辉煌需要更为艰苦的努力。

今日的纪念是期盼未来的美好。

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子文库编委会
2009年6月

自序

1979年,西南政法学院创设刑事侦查专业,不觉间至今已经30周年了。在学校筹备隆重的庆祝活动之际,作为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专业的首届毕业生,念及母校的栽培,师友的情缘,倍感亲切。追忆求学往事,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成了抚慰心灵的美好感受。

我在母校的时光不过四年,但我在那里得到的修炼和教化受益终生。所以,对西南政法大学,我始终怀着无尽的感恩之心。母校的包容、博爱给了我无限的温暖,让我这个来自天涯之滨的学子感到人生的美丽和幸福;母校的上善、厚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如今可以提笔来抒写儿时的梦想和壮年的奋斗往事;母校的真诚、无私,让一个自幼备尝艰辛的贫寒子弟领悟到公平、正义的真谛。

遥想30年前,鄙人历尽艰辛,方才得以迈进高等学校大门读书。如果没有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路线,我们学校就不可能恢复重建;如果母校没有恢复,我们也没有机会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如果没有母校的接纳,我不知道自己如今会漂泊向何方,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如何书写。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所提供的人生机缘,我内心里感念至深。

我原本并没有报考西南政法学院,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真是喜出望外,而且看到录取通知书上还写着“绝密专业”字样,更觉得很神秘,所以,就非常高兴地从遥远的海南岛辗转奔波一周,来到重庆歌乐山下,进入这所全国重点大学就读。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和憧憬,记得父老乡亲欢欣鼓舞的场景。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无比温馨。

当我怀着无限的憧憬,来到这所全国重点大学时,一下子被她周边的景象镇住了。近在眼前的歌乐山时常烟云缥缈,仙气盎然。《红岩》所描写的景物和故事在学校周边就能看到或听到。苍松翠柏环绕的烈士墓就在校门外的小山坡上,肃穆庄严。几里外的嘉陵江浩浩荡荡,横无涯际。当时我常想,如此风水宝地,必能孕育出国家栋梁之才。

但是,当时母校的校园和我入学前的想象又差得太远。那时的母校,作为全国重点高校,和今日的任何一所大学比较起来,其硬件条件堪称极差。整个校园荒草丛生,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进入校门不远处,通往教学大楼的百级台阶通道,明白无误地告诉任何来客:这个学校的校园是坐落在山坡上的。教学大楼正好坐落在学校最高的山坡上。站在教学大楼往外看时,东坡下面是某部队的连队驻地和养猪场以及沙坪坝地区的农田、池塘。向西则是高耸的歌乐山。歌乐山脚下和我们学校一路之隔的是四川外国语学院。向南则是起伏的小山包,山包上也是一个部队营地。校门外的山坡是著名的重庆烈士墓,正北方山坡下是重庆烈士陵园所属的展览馆。

屹立于山坡上的凹字型办公教学大楼,是学校当时唯一值得一提的重要标志。这栋红砖五层大楼既是学校的行政办公大楼,又是教学科研楼和教学楼,还是学生宿舍楼。我们刚进入学校时,因为学校还没有建起学生宿舍,学校把男女同学都安排住在这栋教学大楼的南侧。78级和79级的学生都集中住在一起。图书馆则是在一栋类似仓库的房子里。食堂坐落在北边一栋类似大仓库的房子里。入学第一年学校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运动场都没有,只有凹字型的教学大楼空地上修建的篮球场可供学生锻炼身体。因为整整四年我都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我印象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场所。由于重庆经常下雨,校园的道路极其泥泞。看到学校基础设施如此之差,再和重庆大学等高校一比较,有些学生很不满,就给学校起了个很不雅的外号。由此可见当时的条件何等之差。

校园内唯一值得称许的景致,大概要数校园门口的景色了。从烈士墓门前进入学校大门不远处,可以看到高大的树木林立马路两旁。校门右边有一个小池塘,池塘中间有一个人工岛,上面有一个小楼亭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中。

为了尽快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国家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母校投入了很大一笔建设资金,开始大规模基建。现在的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几乎是同时动工的。一时间,整个学校成了一个大工地。食堂大楼是劈开半山腰建起来的,而新学生宿舍则是在铲平几个小山包后修建的,所以,建设工地上开山炮声不断,挖土机的轰鸣声更是日夜不停。经过建设者们的日夜奋战,到第二年,学校的食堂大楼建好了,学生的伙食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还成了当时全国高校学生食堂管理的样板。第三年男女生宿舍分开建好了,78、79、80级学生同时从教学大楼搬进了新的宿舍楼。这才结束了男女生混同在凹字型侧楼的历史。等到我们快毕业时,新建的图书馆也投入使用了。我们的学业进步就这样和学校的建设步伐同步进行着。

入校之初,不仅学校的基础设施差,学习条件也异常简陋。上课所使用的教材绝大多数都是学校自行铅印的,第一学年,我几乎没看到过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许多教学资料都是油印的。据说,那时候连著名教授要出版著作都非常困难,所以,老师们就自己编辑教材并铅印出来给学生学习。至今我还收藏着许多当时学校铅印的教材,每次搬家整理书架时翻出来一看,我都感慨不已。刑侦专业的实验室异常简陋,一些中学现在常见的化学、物理实验器材我们都没有,只有照相实验室还算差强人意。现在中学生学英语常用的录音机是稀罕物,现在时髦的电脑投影装置、课件就根本没有。我们在图书馆读书时,如果看上哪篇文章,只能动手抄写,根本不可能想去复印。因为复印机也是稀罕物,而且费用也很贵,我们即便想复印也付不起费用。

在这样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使出浑身解数,居然为共和国培养出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一流的法学家和无数热衷报效国家的有为之士,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大奇观。这也真应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

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刚刚恢复工作回到母校,十分珍惜难得的教学科研机会,因而纷纷亲自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知识都全部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所以非常投入。比如国内刑侦学界第一位评上教授的周应德,法制史前辈张警教授,经济法学界开拓者之一种明钊、李昌麟教授,刑事诉讼法学界前辈常怡教授,刑法学界前辈伍柳村教授,法理学界知名学者卢云教授等,有的直接给我们开办修课,有的开选修课,有的则举办讲座。其他高校一些名声如雷贯耳的法学界泰斗、名流也纷纷被邀请到我校举办讲座。可以想见,我们经常直接得到著名学者面授,所学到的知识肯定是当时法学界最新最前沿的知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就是著名博导亲自给本科生指导学业了,所以,由不得我们不认真学习,也由不得学校培养不出高才生。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思想解放大潮汹涌澎湃,法制建设被提上非常重要的位置,宪法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等立法工作大规模展开,全国公检法系统都致力于恢复重建,全国法律院校建设刚起步,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方兴未艾,法律界和法学界显现出非常兴旺的景象。母校老师们积极投身国家法制建设进程,或者参加国家立法活动,或者参与办案实践,或者组织各种学术讲座、研讨会,非常忙碌,给我们感觉学校非常有生气、有活力。在这种浓厚的法制建设氛围中,我们深受感染,学习积极性非常高涨。

一些革命资历很深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后担任学校领导,真诚拥护改革开放路线,对学校管理非常用心,对法制建设、法学教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当时,由于学校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党政干部队伍管理、学校规章制度建设等

等,都处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以刑侦专业为例,当时学校刚组建这个新专业,还没有建立刑侦系,刑侦专业教学科研管理乃至实验室建设都由刑侦教研室承担。为了把这个专业办好,学校忙于召唤原来的刑侦专业教师归队。刑侦教研室白手起家,建立学科体系,编写刑事侦察学、痕迹学、文件检验学、预审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等教材、实验案例,组建痕迹检验、刑事照相实验室,开展科研,忙得不亦乐乎。我毕业后,一些老师来北京时经常和我说起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令我深为感慨。有一件我亲历的事,可以为证。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经常跑到国家图书馆读书,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找到许多关于刑侦专业方面的外文书籍资料。我觉得对母校可能有参考价值,就告诉时任刑侦教研室主任刘泽贵老师。刘老师当即决定委托我帮助收集、复印这些资料。我为此花了一个多月业余时间,找图书馆联系,查阅馆藏的图书,并筛选出50本不同专业方向的著作,然后复印、装订好,还请图书馆装帧了漂亮的封面,然后邮递给刑侦教研室。收到这套图书资料后,刘老师如获至宝,马上组织人员翻译了其中的一些资料,供老师和学生研究参考。他在世时,每次出差到北京见到我,还常提起我义务帮忙办理的这件事。不知道母校刑侦学院如今是否还保留着这套图书?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学生学习和成长非常关爱。我们经常看见,学校领导和管理干部悄悄地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和学生拉家常,非常平易近人。一些老师对待学生如同亲人,经常嘘寒问暖,关照有加。有一次,当我学习刑事照相课,正按照老师要求到处在校园溜达,找景物练习拍照,恰好在路上遇到胡光院长时,我就主动走上前请求为他拍张像。尽管他明知我是在练习拍照,他不仅答应,而且还很乐意配合。这让我很感动。当时使用的是120反转照相机,需要自己调焦距、光圈,而我又刚学习照相技术,拍出来的相片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我一直也不好意思把他的相片拿去送给他。但是,为了作纪念,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幅令人尊敬的老院长的黑白照片。

那时候,学校不仅重视法学教育建设,注重传授学生的专业知识,而且对学生的道德修养的培养也非常重视。我清楚记得,我们年级管理干部、党团组织经常利用地利之便,组织学生去附近的烈士陵园、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先烈牺牲的地方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清明时节去祭奠烈士,参观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缔造者在重庆开展革命活动的事迹等。周末,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去校门外的烈士陵园及展览馆门前广场和草地上谈天说地,怀古论今。一些志向远大者还乐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相互砥砺。晚上宿舍关灯之前,同寝室的同学经常就社会热点问题、理想信念问题、校园逸闻趣事等相互交流思想。谈兴未尽者,第二天还相约散步,继续谈论。这些精神上的教化,对塑造同学们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无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是母校恢复办学第二年入校的。在我的记忆中,78级和79级师兄的年龄差距很大,经历各不相同。有些师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毕业生,有的参加工作或者上山下乡多年,有的学弟则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甚至还有中学校长和自己的学生前后脚考进来的。由于普遍深感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个美好时光,也珍惜同学之间的情缘。所以,相互之间相处非常和谐。众所周知,1977年下半年国家才决定恢复高考,77级的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2月份前后入学的,和78级学生入学时间只相差半年。如今77级的学生中就出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见,恢复高考后前三届的本科生中不乏国家栋梁之才。我们学校当时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的重点大学,招生条件本来就高些,顺理成章地网罗来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胸怀大志的青年才俊。有一个好的校风,有一群学术造诣精深的师资,又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学生,当然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是也。

如今政法界和各高校都在谈论“西政现象”——即为何地处西部、办学条件很差,却能够培养出大批的省部级干部、著名法学家和

管理精英。我想,这种现象大概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现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地说是一种现象,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致知躬行的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追求,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一种纯真向善的高尚情怀。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许多78级师兄们和79级的同学们刻苦求知的情景。众所周知,重庆是全国有名的“火炉”,那时学校条件有限,教室里只有简陋的大吊扇扇风,白天在教室里读书非常闷热。连我们这些南方学生都感到难以忍受,更不用说那些北方的同学了。所以,许多学生都喜欢晚上读书,凹型大楼里因此就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熬夜读书的人,午夜1点钟之前挑灯夜读的大有人在。刑侦79级大多数同学因为自己是首届刑侦专业学生而颇为自豪,学习非常用功,而且雄心勃勃。那时候,我所认识的复校后头几届毕业生中,有许多如今成了纵横驰骋于不同法学领域的知名法学家、公检法高级干部、社会精英。这些校友在母校读书时都非常刻苦,其中有些贤达在校时就已经很出名了。我特别了解的一些同学,不仅功课学得好,而且志存高远,品行修养极佳,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猜想,那时候他们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领悟透彻了。

那时学校倡导致知躬行,鼓励学生自由发展。这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学子的成长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知名儒家学者的蒋庆先生(78级学生),当时在新建的学生宿舍墙壁上贴出了一篇用钢笔写就的长篇文章《回到马克思》,引起很大震动,但我们也没有听说学校对他采取什么负面的措施。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兴起,“文化大革命”遗风犹在的氛围下,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鼓励学术争鸣,如此宽容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举动,对学生们自由发挥才华,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对于母校宽松式教育,我体会很深。在中学时代,我非常痴迷文学,即使是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仍然忘我地投入读书中。当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我把在家乡能够借到的“文革”禁书偷偷

读了一番。阴差阳错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社会上兴起“批林批孔”运动,倒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被作为批判对象的四书五经和一些唐宋大家的诗文。当我囫圇吞枣地读了这些禁书后,心里反而暗暗地对中华古代文明非常佩服,虽然不曾想当个文学家,留名千古,但心里始终是欣欣然的。因为这样,当我考入大学之后,我利用课外时间,非常执著地啃着从图书馆借出的大量文学名著。由于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借书,一些管理员一见我来,就主动问我是不是又要借名著看,有的还帮助推荐书籍。后来,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的兴趣也慢慢发生转移。等到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西方哲人的著作之后,我又觉得法学太深奥了,太有学问了,比起文学来更有吸引力,值得认真学习修炼。于是乎,我又把课外时间用来读这些书籍。我不仅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借阅这类图书,星期天还时常跑到市中区的重庆市图书馆去,借阅了许多学校所没有的法学名著。1981年前后,正好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了一套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我为此经常光顾沙坪坝书店,翻看新出版的这套书籍。一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就买回来(至今我还藏着80年代初出版的几十本这套图书)。这期间,因为我是靠国家助学金(最高额度每月十七元伍角)和家里微薄的补贴生活,而自己又喜欢买书,当然就得从饭费中抠出来了,所以,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倒也自得其乐。但凡学校请来外国或国内知名学者举办公开讲座时,自己总爱乐不可支地跑去旁听,也不管是否能够听得懂讲座的内容。

由于入校时分在刑事侦察学专业,我自然要先把本专业的学业完成才行,否则无法面对教我的刑侦老师们,所以,我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课余时间去看法律专业的书籍。好在当时除78级有师资班外,母校仅有单一的法律专业。复校第二年,学校才建立起刑侦专业,所以,当时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的许多课程是相同的,仅有几门功课有所区别。这也给我和一些偏好法学的同学留下了自由选修的空间。

因为这样,我甚至暗自庆幸,自己可以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程,而且还不怕耽误整个学业。这就很让我心满意足。许多刑侦专业的老师特别是刘泽贵、王成荣、邹明理老师也知道我“不务正业”,但始终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干涉过,有的还给予过肯定。每每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都倍感亲切和舒心。

因为学校对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的分野不是很严格,所以,刑侦专业学生可以选修法律专业的课程,反之亦然。79级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有一些公共课程是相同的,三百多人挤在很大的教室里一起上课。毕竟刑侦专业本质上也属于法学范畴,所以,实际上我校当时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很妥当的。在我们第三学年选择要撰写学年论文时,学校还允许不同专业的学生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不用受自己所在的专业限制。当时因为我刚听过赵长青教授的刑法学课程,深感兴趣,就自选了刑法学题目来写学年论文。等到第七学期,学校教务部门还下发通知,允许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的学生可以自由交叉选择毕业论文题目。这个政策体现了学校鼓励学生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宽容精神。我为此甚感欢欣。在听了西方法律思想课程之后,我索性就选了法哲学的题目来研究。教务部门和老师们不仅允许我这样跨专业去写法哲学论文,而且也允许我以此作为毕业论文。至今想来,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实在太开明、太宽厚了,其管理理念委实超前。为了表示对母校的敬重,我把当年撰写的这篇习作保留了下来。现在又把它作为本书的开篇收在文集中发表出来。这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后来,当我在大学工作时,我自始至终坚信,任何大学不仅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胸怀远大、积极向上的世界观,陶冶其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尚情怀,而且还应通过各种办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独立性以及协作能力。惟有这样,她才能为国家出培养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之才。否则,如果按照一个模子去训练学生,要想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恐怕是很困难的。

我猜想,一些校友毕业后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肯定和他们在大学时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密不可分的。就我个人体会,我觉得在西南政法学院时期养成的自学习惯和独立思考的品格,对我后来的学术工作影响很大。记得大学第四年时,我又喜欢上了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也很浓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时,就选修了国际法。非常庆幸的是,今天在从事实务工作时用上了这些专业知识。当然这是后话。

1999年,当我时隔16年回到母校参加庆祝入校20周年纪念日活动时,我曾对自己没有留校工作暗自感到非常后悔。记得毕业分配前夕,著名法学家卢云老师(时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和薛老师(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看了我写的毕业论文之后,两次把我找去,郑重地和我谈了两次话,提出希望我毕业留校,到国家与法教研室任教。可惜,由于我在校期间始终难以适应四川麻辣菜的习惯,身体很瘦弱,所以,我非常遗憾地谢绝了这两位老师的好意。那时,学生毕业分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卢老师第二次找我谈话时告诉我,他是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才找我谈话的。但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老师们也没有强迫我必须服从分配。刚离开母校走向社会的时候,我常常深感有负卢、薛两位老师的厚爱。至今想来,如果留校工作,我可能会走上不同于今天的人生道路了。不过,这大概也应验了胡光院长在我们毕业典礼上说过的一句话的正确性:“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可能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笔直。同学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刻都必须努力奋斗才行。”可见,人生是不可能按照预先的计划去度过的,未知的前程时时考验着每个人的良知和智慧。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工作。大概是温良恭俭之道的长期教化使然,尽管自己常怀豪迈之气,但仍能安心在公安大学工作,从助教到教授、系主任一路走来,一边努力从事刑侦专业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把在母校所学到的知识

和新学到的学问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一边把精力放到探索自己喜欢的法学新知上,努力在教学、科研、管理的轨道上奋勇前行。屈指一算,我在这所大学里先后工作了18年。这期间,我还考入北京大学攻读了刑法学博士学位,也出国深造过,还下派到基层公安机关挂职过领导职务。那时,我常常用斯宾诺莎一边以磨镜片为生,一边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例子来加以自勉,不甘于庸碌无为。为了能把刑事执法方面的学问和国际法结合起来,既兼顾单位的工作,又满足自己的爱好,我颇费了一番心思,经过深入思考,决定把国际刑法作为主攻方向,于是,先从国际刑警组织入手,逐步深入到国际刑法、国际司法协助、跨国犯罪、反恐怖主义、国际警务等领域,一直坚持下苦工夫钻研。经过十多年的修炼,尽管由于才疏学浅,谈不上著书立说,但倒也小有收获。我陆续发表了不少国际法、国际刑法、刑事侦查学、刑事诉讼法等专业领域的文章,主编或参编了若干著作和教材,出版了5本个人专著(《国际刑法与司法协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区域刑法论》等),编辑出版了100多万字的《国际刑法约章选编》。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富强。伟大的祖国焕发出昂扬生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和谐社会建设成就斐然。有幸生逢如此盛世,我们为自己能够有机会投身到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列中,倍感光荣;为自己能够在国家法制建设的道路上留下奋斗的足迹而无限欢欣。扪心自问,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青春年华并没有虚度,我们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所流出的汗水没有白费。我至今坚信不疑的信念是,此生应为国家尽力效劳,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奋斗的印迹。

在母校恢复建校30周年之际,母校师长邀约我提交一部著作,以便编入学子文库,我欣然从命。业余,我就把这些年写的论文做了整理,选出有代表性的不同学科的小部分论文,编成个人文集,交付出版。凡是此前已编入个人文集《涉外刑事司法解析》(吉林人民出

版社 2001 年出版)的论文,原则上不再收入本书中。与法学没有太大关系的其他文章也不收入本文集。这次收入文集的文章,有新篇旧作,其中有一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一些旧作,如今看来还有学术意义,所以,也不揣浅陋,原样不动地编进文集中。

学得越深,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越发觉得法学的海洋宽广无边,即便我穷尽一生之力,也仅能捡拾到其中的几片贝壳而已。思来想去,我就把这本文集命名为《法海拾贝集》,聊作为献给入校 30 年的贺礼,求教于师长、校友和同行们。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漫长的 30 年间,写了许多文字,如今能够结集出版,对于曾经以做学问为幸事的学子而言,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在文集即将付梓之时,我必须说的是,非常感谢西南政法学院时期的同学、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院院长管光承教授和其他同仁的盛情邀约,也感谢群众出版社诸君为出版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末了,附上专门填赋的一阕新词,作为追忆 30 年时光流逝的感悟之言,献给各位师长与同窗。

贺新郎

入西南政法学院卅载志贺

己未年秋,我等诸生云集歌乐山麓求学。时西南政法学院复校伊始,百业待兴。衮衮诸公借此砥砺报国之气,锤炼建功之艺,方有今日英才辈出之功。适逢卅年庆典,填《贺新郎》一阕,以兹祝贺。

卅载转瞬逝。

蓦回首,杏坛往事,恍若昨日。